

Nagatomi Hirayam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Chinese Radical Right, 1918–19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xiv+296 pp.

蔡旻遠*

近年學界對第三勢力的關注日有所增，重新描寫、分析、評估這批過往不在主流敘事的人物群體，成爲補足歷史認識空白的重要拼圖——黃克武對於顧孟餘其人其事的爬梳，即爲一例。¹在此一新的研究視角下，國共之外的第三大黨——中國青年黨（Chinese Youth Party）——重新獲得關注，並不讓人意外。其中，平山長富於2022年出版的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Chinese Radical Right, 1918–1951*，是近期對此課題最爲完整的研究成果。作者揚棄革命史觀，改採全球史視角，以「激進右派」的角度切入，觀察青年黨1918-1951年間如何將「政治思想」與「行動」兩相結合，從而展開政治活動，並關注群眾政黨政治於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後五四時期的形成與變遷。

本書在章節安排上，除導言、結論外，共計六章，依內容性質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關注青年黨的起源與發展背景，由第二、三章組成：〈五四時期中國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¹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單就專書而言，也有更寬泛地將非國非共的短暫政權視爲「第三勢力」討論者，如橋本浩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の研究：第三勢力による反蔣抗日政權と内外諸勢力》（東京：汲古書院，2022）。近期華文學界亦有相關之單篇研究成果，參見黎冠忠，〈中國青年黨的意識形態（1924–192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1月）；曾輝，〈全面抗戰時期民主力量的聚合——以青年黨、第三黨爲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學》，2021年第6期，頁75-82。

政治右派的起源》(Origin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Right in the May Fourth)、〈「少年中國」在歐洲：中國政治右派於「極端年代」的興起(1919-1924)〉(“Young China” in Europe: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Right in the Age of Extremes, 1919–1924)。作者於此梳理青年黨作為激進右派誕生的內、外兩層因素：內部因素關注五四運動後的政治與思想環境，外部因素則關注五四青年的留學經驗如何影響其政治取向與意識形態。第二部分則為本書核心，由三章組成：〈軍閥時期的思想與政治：中國青年黨的國家社會運動(1924-1937)〉(Ideas and Politics in Warlords’ China: The CYP’s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1924–1937)、〈筆與槍：中國青年黨的軍事動員(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中期)〉(Pen and Gun: The Chinese Youth Party’s Military Mobilization, Late 1920s–Mid-1930s)、〈走向地方：中國青年黨在四川(1926-1937)〉(Going Local: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in Sichuan, 1926–1937)。作者於此剖析青年黨作為「激進右派」，在混亂的軍閥時期如何運作？其政治思想的變化如何影響政治活動？最後評估這些政治實踐獲致的成果。作者在第二部分闡明青年黨確實在論述建構、民眾動員、地方發展等面向，發展成具競爭力的政治力量，但也因為缺乏與合作對象制度性的連結，從而在政局競爭中處於落後。本書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七章：〈告別革命：從國家社會主義者到民主社會主義者〉(Farewell to Revolution: From National Socialists to Democratic Socialists)，指出在最能動員民心、鼓動民族主義的中日戰爭階段，青年黨卻放棄激進的民族/國族主義立場，從革命政黨轉型為公民反對政黨(civil opposition party)。這象徵該黨激進右派性格的結束，改以民主運作方式參與政治。

最後，作者就「全球政治視野」與「今昔對比」兩個維度，突顯青年黨的成就和歷史意義。作者認為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懷有的三個願景，其實正是1920年代以降，青年黨所擘劃的理想中國樣貌：一、立足並強調自身傳統文化；二、藉由結合政治威權與國家資本來建設富強民族國家；三、與以美國為首的特定政治現代性詮釋(自由民主)，在全球舞台上展開競爭。事實上，對

照今日世界各地死灰復燃的激進左、右派政治，重新回顧百年前青年黨的興衰，更提醒我們迄今仍未完全擺脫極端時代所遺留的思想與政治框架（頁 252-256）。

本書架構與內容簡介大致如上，下文將就本書論旨與突破之處，進行討論。筆者認為本書的創獲，環繞在四個相互交織的面向：論述框架之設定、政治思想之繼受及其五四背景、政治活動之激進以迄妥協，以及意識形態之退縮與民主趨同論。

首先，過往討論第三勢力的困難之處，在於敘事的定位——國共革命史觀之外的路，不在於從舊有論述框架下補充其他視角的資訊，而在於重新設定觀察的座標。本書的回應方式有二：帶入全球化視角以及重新定位三大政黨。作者援引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極端時代」（Age of Extremes）的觀點：

「短的二十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是一個「極端時代」，其第一階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左翼激進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法西斯主義者的崛起（頁 59）。

承襲霍布斯邦的觀察，本書指出一戰後這一趨勢不僅限於歐陸，在中國亦有類似發展（頁 5、59）。披覽全書，讀者也不難發現，若干章節所描繪的歷史圖景，正是在「極端時代」這一普遍性框架下，中國個案所呈現出的在地獨特性。換言之，本書在引用「極端時代」之時，已然將全球史的比較性格帶入討論。

而在重新設定三大政黨的定位上，作者先是在寬鬆的條件下，定義「激進」與「右派」兩者（頁 8）：「激進」是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截然二分、彼此衝突的思維方式。²「右派」則是評斷政黨政治光譜所使用的名詞（頁 7）。

² 該時代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切割態度，已有不少論者關注，可參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85-122，特別是頁 87；余英時，〈20 世紀中國的激進化〉，《人文與理性的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35-339、〈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局，2004），頁 8-42，特別是頁 36-37；馮兆基著，劉悅斌、徐礎譯，《尋求中國民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 24。

作者嗣後將共產黨定調為「激進左派」，將國民黨視為「意識形態晦澀難解（opaque）的軍事化執政力量」（頁 1），這一操作解放了已往敘事中為國民黨佔去的政治光譜右端（頁 13），並將之讓予青年黨，此一手法與過往研究明顯不同。

藉由上述框架與定義的設定，作者得以突顯論述主軸，先是按時序描寫青年黨的興起：全書前半段聚焦於青年黨、共產黨之間的同源與後來的對立，關照群眾政黨政治的形成背景與發展契機，後半段則轉移至青年黨、國民黨之間的競爭、衝突與最後的合作。另一方面，則緊扣中國激進右派的發展與衰弱，而不僅止於單純的黨史寫作。是故，本書已超過馮兆基、王奇生等人以平行兼論三黨互動，藉以打破國共二元的書寫方式。³同時，也避免了僅單純轉移視角（至青年黨），而未重新定位國共兩黨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這一操作賦予本書全球史的意義，將中國 1920 年代以降的政治發展與國際局勢連結。

本書另一亮眼之處在思想層面的爬梳。這一課題的意義在於闡明晚清文化保守主義與民國時期激進右派的思想連續性，是對中國激進右派進行思想溯源工作。正如論者所言，中國思想界因歐戰影響，強調自身民族文化價值的「文化論述」興起，從而與帶有西方中心論的「文明論述」分道揚鑣。⁴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作者認為，當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對傳統文化遺產的正向觀點，被非「反傳統主義者」接引時，這群人便成為「選擇性將中國傳統化作重建中國資源」的保守型現代主義者（頁 29）。而這正是青年黨創始人「文化民族主義」立場的起源（頁 11、25）。對青年黨領導者而言，既然「文明的中國」是現實中國（民族的中國）的精神基礎（頁 31），他們便能據此在兼顧民族共同體需求之際，同時就政治、經濟領域提出積極意見（頁 8）。作者認為青年黨此一文化、政治態度，一來和當時國、共兩黨有所區隔，

³ 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頁 12；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頁 87-88。

⁴ 黃克武，〈從「文明」論述到「文化」論述：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轉折〉，《反思現代：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頁 27-48。

二來也挑戰林毓生的論斷，顯示「全然的反傳統」，⁵並非時人們所公認的五四精神與面貌，原因在於青年黨領導人正是一群看重傳統文化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緊隨其後，作者分析五四青年對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如何形塑其政治行爲。具體而言，五四青年對於共和主義的認知，讓這群弄潮兒瞭解到群眾亦是政治的一環，這使「群眾政黨政治」一躍成爲當時的選項，更成爲五四之後的政治特色。而五四青年對無政府主義的認識，則暗示一條思想與實踐的可能路線：遠離現實的政治改革或革命活動，轉而以社會和文化轉型活動爲主。固然，這一趨勢曾爲林毓生所洞察，然而他並未注意到時人這一轉念，恰是少年中國學會建立的契機。換言之，作者認爲「學會」這種組織，正是五四時期新知識青年普遍政治化趨勢下的結果（頁 251）。

作者隨後調轉筆鋒，重回五四歷史現場，關注運動的中介性質。作者強調五四提供一個契機，使這批新青年建立起社會網絡，從中展開交流、凝聚力量，形成更具體的政治活動（頁 22-24）。作者以少年中國學會的分裂爲例，指出青年黨的形成，與中共在歐洲的活動有著直接關係。中共在歐洲的活動，除了讓自己成爲激進左派革命者的角色外，更將一批人推向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成爲與之競爭的激進右派革命者（頁 87）。

綜上所述，作者藉由描寫政治思想的繼受，突出五四的若干面向：就共時性而言，五四提供了「群眾政治」的選項，同時更是激進左派之中共與激進右派之青年黨誕生的原因。就歷時性而言，晚清以降之新興保守思潮，藉由五四成爲日後右派群眾政治的思想基礎。而在精神氣質上，五四固然有其反傳統激進的面貌，但文化保守的一面也不應忽略。

本書第三個可觀之處在於闡明「中國極端右派」——青年黨——政治活動從激進至妥協的過程。作者此處論述可細分爲二：一是進一步描寫「中國極端

⁵ 林毓生著，楊貞德等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頁 17-25。

右派」的特色為何，另一則是檢視青年黨政治活動的衰弱與原因。

誠然，作者勾勒出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的左右分流，與「極端時代」之大敘事相符。然而，霍布斯邦所謂的極端右派——法西斯，卻與青年黨的本質有所差距。作者於此順勢闡明「中國極端右派的獨特性為何」這一課題。具體操作，作者採取「全球」、「區域內部」兩種層次的比較。青年黨作為極端右派的特色有二：其一是他們對自由民主的態度並非敵意，而是對其建設中國的無能感到失望，因此他們強調國家權力在個人自由之上。其二在於他們的意識形態，絕大部分基於文化保守主義的術語表達，且從未以種族（漢族）優越的角度展開論述。上述兩點讓青年黨與「全球」視角下的法西斯截然不同（頁 248-249）。其後，則將青年黨與活動於中國「區域內部」的藍衣社等相較，從另一角度突顯青年黨與法西斯的差異（頁 250-252）。

作者認為青年黨政治活動的衰弱，關鍵原因之一在於他們和具實質軍事力量的軍閥缺乏制度化的連結，導致兩者合作關係並不穩固（頁 147）。同時，青年黨人的政治活動也較集中於社會上、中層和學生，儘管黨人意圖擴展地方組織和黨化軍隊，可惜在一切尚未成熟到足以挑戰國民黨之時，便被當權者擊垮。抑有進者，作者著手分析共產黨與青年黨這組競爭對手，就軍事層面所採取的不同行徑，如何導致兩黨日後的迥異發展。這當中有兩點殊值提出。第一，青年黨和中共都曾嘗試軍事革命，但是青年黨的軍事力量缺乏立足於地方的韌性，因此在不利環境下，軍事活動難以持續。反觀中共藉由一系列社會經濟重建計畫，牢牢紮根地方。第二，兩黨在 1930 年代儘管都對國民黨妥協，然而青年黨選擇告別革命，轉變為沒有堅實軍事實力的民主在野勢力。與之相較，中共則繼續經營華北根據地，保持革命力量，成為戰後與國民黨競爭的基礎（頁 176）。

隨著中日戰爭發生，青年黨激進右派的角色，如何因應國際局勢產生改變？外在因素是當時需要聯合英、美與日本對抗，青年黨須放棄過往的政治論述與意識形態，向英、美盟友的自由民主立場靠攏，而不再堅持過去與之競爭

的世界觀。內在因素則是中日戰爭迫使中國政界需要表現出願意共同合作的氛圍。是故，國、共需淡化自身一黨專政的色彩，青年黨亦得表現出自己能夠妥協，參與黨際對話的意圖（頁 208）。持平而論，內在因素過往已有學人關注，⁶而外在因素則是作者提出的新詮釋。青年黨的轉機正是緣於意識形態上的退縮（去激進化），不再堅持革命，因此可以在「民主」這個沒有硝煙，無關軍事力量的戰場上和國民黨周旋。作者循此思路，就戰爭階段的民主趨同性深描細寫，認為對日抗戰放大了小黨的訴求聲量，使政黨間的競爭與角力，有機會在民主協商的規則下進行，最後為 1940 年代「憲政民主」的興起奠下基石。⁷在這過程中，青年黨及第三勢力留下了若干政治遺產。就中共而言，這是他們日後所謂「民主」運作的基礎；就國民黨言之，則是獲得一套有公信力且足資運作的憲法（頁 243）。

本書對於近代中國思想的發展與理解，尚有可資分疏與商榷之處，茲爰述如下。首先，知識分子對於救國之道的搖擺，是政治下手，還是文化下手？⁸是自上發之，抑或自下發之？⁹乃至是「行」政治，抑或「談」政治？¹⁰這是中國近代知識人的共同疑惑。作者固然藉由曾琦心中政治偶像的不斷改變，帶我們窺見這一面向，然未進一步展開，殊為可惜。描述這一共相的重要性在於彰顯青年黨創始人與五四世代面對時代時，有著共同的徬徨、困惑與各自的摸索。是故，若能就此面向展開，並鋪陳歷史圖景，或能在初始便強調無意追求「新

⁶ 除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外，尚可參看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⁷ 然不應忽略前人研究中，都曾言簡意賅地表明抗戰、民主、第三勢力，三者之間的連結。可參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頁 146；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頁 355。

⁸ 梁啟超往復於政治、文化兩界的心境變化，頗能展現此點。詳參：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特別是第 9 章的討論。

⁹ 此為早年胡適與好友許怡蓀對於救國之道的爭論。詳見蔡旻遠，〈知識分子的人際關係與政治選擇——以胡適為中心（1917-192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 年 8 月），頁 52-56。

¹⁰ 君勳，〈直奉戰後政變之教訓〉，《努力週報》，期 8（1922 年 6 月 25 日），第 3 版。類似用法尚有「坐而言，抑或起而行？」，這一對比被黃克武用於胡適與顧孟餘身上。詳參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頁 60-68。

人物」視角之餘（頁 22），更突出這批日後都投身於群眾政治中的青年黨人與其他五四世代青年，在時局選擇，以及政治、思想性格的異同與張力。

其次，則是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作者認為通過考證青年黨的政治行為與影響，將修改學術界對「中國知識分子於 1920 年代激進的政治領域中，無能為力」的印象（頁 12）。全書儘管未見余英時「知識分子邊緣化」的觀點及後續相關討論，¹¹然概覽全書，不難發現作者對此持修正態度，認為「知識」分子於明確意識形態之下，足以成為「滋事」分子，動員民眾，組織革命。對此，筆者認為稍嫌可惜之處在於，作者曾使用若干篇幅描寫五四青年世代的人際網絡及其資源，¹²甚至直言青年黨員在不同政治、軍事陣營中所留下的合作關係，在日後仍持續發酵（頁 142），但卻未見將其納入這一課題的評價與討論中。依筆者管見，知識分子在這一動亂、日見激進的時代中，最特殊的就是在人際關係基礎上，形成「權勢網絡」，¹³後續藉由「權勢的槓桿」，¹⁴透過制度發揮出與自身相比，巨大到不可思議的影響力。

最後，筆者認為本書著力於考察青年黨作為激進右派的興衰，因此將時段限縮於 1918-1951 年。然考量到青年黨的存在，不因其失去激進右派的定位而畫上句號，於此便可延伸兩點討論：青年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退縮，究竟是轉機抑或是危機？青年黨在戰後的發展為何？過往研究確實未如本書系統性指出青年黨於思想光譜上陷入無以立足的困境，然作者指出此點後，似更傾向將「去激進化」視為轉機，而非危機。誠然，作者承認這一轉向導致青年黨失去藉由訴諸極端民族主義的革命暴力，從而獲得熱情支持的重要政治基礎（頁 176），

¹¹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 33-50。

¹² 此處可詳見本書正文第三章、第四章針對青年黨領導人早年生活，以及青年黨員日後與軍閥聯繫之段落。

¹³ 「權勢網絡」是章清經營許久的概念名詞，較完整的論述可參氏著，《「胡適派學人」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全新修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頁 371-483，特別是頁 474-478。

¹⁴ 此處得聆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兆安教授之高見，不敢掠美，特此誌之。徐兆安，〈革命只是自然趨勢加上人力的一鞭：國語運動與文化權力的摸索〉，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1 年 12 月 23 日。

但作者似乎仍對青年黨這一告別革命、轉向民主的選擇，乃至後續的合縱連橫有著較高評價。後見之明，當青年黨選擇告別革命時，就失去和國、共兩黨競爭的可能性——因為這兩個政黨都不尊重他們在民主舞台上的對手。青年黨嘗試於民主舞台上與兩黨周旋、爭雄，似乎只會徒勞無功。若拋開對民主這一普世性價值的推崇，青年黨走向民主、告別革命的抉擇，單就黨的生命力考量，似有進一步討論、評價的可能。

至若青年黨隨國民黨撤退來臺後實力大不如前，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不容忽視的是，青年黨儘管淪為花瓶政黨，卻在黨外運動漸興之際，成為部分黨外人士的聚集空間，甚至以掛名黨籍的方式投身政壇。例如宜蘭地區的郭雨新（1948年入黨），以及受郭雨新影響而投身政治的游錫堃（1966年入黨）皆是如此。換句話說，青年黨的「中國時期」，被認為是建立中國歷史民主舞台的推手。然在其勢力不若過往的「臺灣時期」，青年黨似發揮著若干消極、意外的作用，以另一角度參與民主化過程。於此，作者提出青年黨為國民黨一方所帶來的政治遺產，僅有一部可資運作的憲法，似乎就有未盡之處，尚須補充一二。

走筆至此，不禁感嘆歷史之弔詭：正是有感於自由民主對改變中國現況的無力，青年黨創始人們才決意執國家主義之大旗，展開革命；然因諸多歷史的偶然，青年黨作為兩強相爭之外的第三者，最後反而是在民主舞台上展現價值。總的言之，作者平山長富在「全球史轉向」喊得震天價響之際，藉由框架設定帶來的視角轉移，重新檢視舊有課題，正是當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能展現的新樣貌。